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民歌《运河号子》

来，听听咱家乡的歌

——沧州民歌改编作品演唱会侧记

本报记者 魏焕光

古老民歌全新演绎

“一条手绢绣个牡丹红，国色天香春意浓。”“运河长，运河宽，男子汉们来拉纤。”

5月26日，“传承·传唱·传扬”沧州民歌改编作品演唱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剧场举行。15首改编后的沧州民歌，既保留了原始韵味，又注入了现代元素，展现了沧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代风貌。

开场节目无伴奏混声合唱《海青歌》，由沧县音协合唱团深情演绎，歌声如大河流淌，唱出了沧州大地的辽阔深沉。春之声少儿合唱团的童声合唱《花狸虎》，则充满了纯真与活力，让人感受到这首秧歌舞曲的生命力。此外，女声小合唱《放风筝》、男声表演唱《运河号子》、男女声对唱《送哥哥进城》等节目，各具特色。尤其是沧州市运河之声合唱艺术团的精彩演出，无论是《丢戒指》还是《绣手绢》，都深深拨动了现场观众的心弦。最后，渤海之声合唱团的混声合唱《黄骅渔鼓》，将演唱会推向高潮，那激昂的旋律仿佛让观众看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和耕海牧渔的渤海渔民。

合唱、重唱、无伴奏合唱、表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灯光、布景、音响等现代化舞美设计的烘托浸染，各演出单位精彩巧妙的呈现，使整台节目表现力更为丰富，更贴近现代审美。当那熟悉的乡音在现代编曲中回荡，观众仿佛看到了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情不自禁地报以掌声和喝彩声。

市群艺馆馆长张广越说，演唱会对沧州民歌进行了一次较大改编和提升，是我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沧州民歌的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传承、弘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30年情系沧州民间音乐

本次演唱会所有作品全部由我市资深音乐编创者常连祥编创。现场，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缤纷的舞台，观察每个节目的实际演出效果，难掩激动：“这些作品凝结着我30年的心血，圆了我多年的梦！”

沧州地处冀东南平原，地方民歌丰富多彩，这些民歌无不表达着沧州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意志，是他们勤劳和智慧的艺术结晶。

常连祥说，小时候，他通过母亲哼唱的民歌小调和各种民间艺术启蒙，对民间音乐产生了兴趣，1979年进入市群艺馆工作后，更是广泛深入接触到了沧州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如落子、高跷等，并认识到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来源于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积淀。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总汇，《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一开始编纂，常连祥即参与其中，开始了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这项工作既具有抢救性质，也有前瞻意义。

为全面掌握当时沧州民间音乐的现状，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常连祥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沧州乡野。面对老一辈艺人记忆力衰退、录音记谱工作繁难等困难，他深刻体会到民间艺术抢救的重要性，也深深被沧州民间音乐的丰富多样和艺术魅力折服。目前，他手中保存着全市唯一一套全面记录沧州民间音乐风貌的光盘。按下播放键，那些来自旷野民间的歌声，穿透历史云烟渺渺传来，令人心灵宁静。

在随后的岁月里，常连祥以细腻的情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将古老的沧州民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他的儿子常城也参与到创编工作中来。每一首曲目的改编，都像是从历史长河深处挖掘出的宝石，经过精心打磨，闪耀出全新的光芒。从激昂的劳动号子到婉约的爱情小调，每一段旋律都讲述着沧州市井的故事，唤醒着听众心底最深的记忆。

民歌改编有啥“秘诀”

演出间隙，常连祥“揭秘”了改编民歌的方法。据他介绍，根据已知的资料，沧州西部4县市的民间音乐文化已融入冀中，所以新民歌比较多。最为丰富多彩的还得是运河沿线的8个县（市、区），并辐射到东部沿海县市。传统民歌按照体裁，可分为山歌、小调和号子。沧州只有一座小山，所以只有小调与号子，其中小调更为丰富。

常连祥说，民歌改编的意义，是在原始核心的基础上，创新成为与时代同步的艺术产品。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可以填词与改词，使其符合当代审美意识。如流行于沧州东南一带的秧歌表演形式《花狸虎》，原来叫《十个字》，即每段一个数字，唱“刘备、吕蒙正、二郎神”等十个古人。他把歌名改为《中华好少年》，歌词改为家喻户晓的勤奋、智慧、勇敢的少儿故事：“车胤苦读囊萤光，匡衡凿壁偷灯光，李白铁杵磨成针，勤奋少年美名扬。司马光救友砸水缸，曹冲船上来称象，甘罗十二拜上卿，才智少年美名扬。岳云银锤战疆场，突围搬兵荀灌娘，孙叔敖勇斩双头蛇，英雄少年美名扬。”

其次是扩充民歌结构。传统民歌曲式结构一般较短小，属于多段体的分节歌，缺乏展开和对比，需要更为充实的内容。此次改编，《抗洪夯号》由4首民歌连缀，《新媳妇回娘家》由《回娘家》和《五棵树》组合，其它曲目也都进行了结构扩充。比如合唱《黄骅渔鼓》是为黄骅市渔鼓申遗而作，改编后，增加了引子部分，用人声模仿螺号，将听众带入大海的辽阔意象中。此外，改编民歌时，常连祥还在旋律、多声部编配及其它手段上进行了有益尝试。

河北师大音乐学院教授胡小满，带领研究团队到演唱会现场观摩记录。他表达了对沧州民歌传承、保护和创新的肯定。他认为，正是数十年前音乐工作者们的收集、记录，才有了民歌更好的传承，才有了今天这种演绎方式的承递，我们应该向民歌的吟唱者、记录者，向音乐会的组织者、编曲和演唱者们致敬。当下，这种有传统性、地方性的艺术创造并不多见，这也是这场民歌演唱会的价值所在。

民歌《放风筝》

民歌《新媳妇回娘家》

民歌《花狸虎》

本组照片摄影：边志明

采访手记

传统艺术的回归与创新

记者采访过很多场音乐会，但这场演唱会深深触动了我。

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份文化的传承、一次传统艺术的回归。演唱会的每一曲都是对过往的敬意，每一曲都饱含着对未来创作的启示。在众多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声中，这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为珍贵。

这不仅是一场演出，还是沧州艺术创造精神的一次接力。编创者常连祥，30年痴心如磐，足迹遍及运河岸和渤海湾。他的坚持与创新，是对沧州民歌的深情献礼，也是民乐永恒价值的有力证明。更为可贵的是，有关部门看到了这份可贵的传承，积极为其搭建起艺术传承展示的舞台，让我们看见了运河岁月的沧桑，听到了运河儿女的心声。

这不仅是一场演出，也是沧州民歌创作的新起点。不管时代如何变迁，那些根植于大地的旋律，始终会在我们心中回响，生生不息。相信在未来，沧州民歌百花园将会更加芳香四溢、绽放光彩。

传说中的君子馆是否献王所筑？

翟鹏飞

沧州西部地区作为两汉河间国故地，存在众多与河间献王有关的遗迹或传说，君子馆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明清以前文献记载的缺乏，以及人们对于文献材料与出土文物的不同理解，关于君子馆性质的认定与位置的考证存在过不同认识。通过对文献材料的考证，可以梳理出关于君子馆认识的变化历程。笔者认为献王修筑君子馆的说法值得商榷。

元以前文献中的“献王筑馆”

《史记·五宗世家》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汉书》中也有类似记录。献王在当时广泛搜集整理古籍，需广泛招贤纳士，而这些贤士安置在何处，正史并未提及。只在《三辅黄图》中可找到这样一条线索“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廿余区，以待学士”。这是目前关于“日华宫”的最早见文献记载，据此推断，“客馆廿余区”应是日华宫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这些客馆是否有各自的专属名称，文献并未提及。

其实，“君子馆”一名在北宋就已经存在。由于其处于宋辽边界地带瀛莫二州之间的重要位置，并且在雍熙三年（986年）还发生了著名的君子馆之战，君子馆因此频繁出现于宋金元时期的文献中，如《宋朝事实》“廷让与敌战君子馆，军败，仅以身免”，《武经总要》《契丹国志》《宋史》《金史》中亦有相关记录。这一地点除被称为君子馆外，也曾被称为君子驿，但在这些文献中君子馆只是一处驿馆，与献王或毛公并未发生关系。

明清河间方志中的“君子馆”

由于君子馆在史书中频繁出现，因此在河间地区明清时期的方志中多将君子馆归入古迹中。在这一时期关于君子馆的认知出现了新的变化，人们开始将它与毛公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最初是通过传说来建立的。万历《河间乘史》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儒生李宦者为予言，往岁有御史胡中者按部，过毛精垒，忽梦一人紫衣扑头来谒，而请曰：“某毛某也，宅败不可居，烦君一理之”。既寤，询诸父老，父老曰此地有毛精垒，相传乃毛苌墓也。因至其处，令人穿之，得石志，上有“明道于君子馆，设教于诗经村”之句。既覆，遂谋郡太守再创今祠。

万历《河间乘史》记载的这则故事不仅情节荒诞，而且具有神异色彩。《河间乘史》本身也怀疑这件事是“乡曲无知见创祠而附会其说遂相传”，并指出该故事的原型应是正德十年（1515年）御史卢雍重建毛公书院的事迹。

自此以后，地方志系统中关于“君子馆”的认知，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于《金史》中的“君子馆”记录以及对以上这则“君子馆”传说的处理方式上。万历《河间府志》采纳了这则传说，将之归入卷十五《闰谭》中的“幽冥感召”，同书的《古迹志》中收录了君子馆，但仅提及《金史·地理志》中的记载，未采纳“明道于君子馆”的传说。

康熙《河间县志》和康熙《河间府志》未收录明代方志中的传说，但在《古迹志》中均收录了君子馆。《河间府志》中引用的是《金史·地理志》中的记录，未提及毛公。而《河间县志》中除引用《宋史》《金史》外，还特别提及了“传云毛苌明道于君子馆”。可见康熙时期府志与县志关于“君子馆”的认知出现了不同，县志开始将这则传说纳入对古迹的阐释中。

乾隆时期，《河间府志》《河间县志》先后修订完成。这一时期府县志的《古迹志》中均收录了君子馆，在其他卷中均收录了明代旧志中的传说，而且在由河间县令所作的叙中，更是直接指明君子馆是毛公校经处。

总之，明清方志中，毛公开始与君子馆产生关联，这种关联有一种从真实性被怀疑的传说逐渐变为可作为参考传闻的趋势，尤其在县志中得到了更多的确认。

“君子砖”发现后的新阐释

清代中后期，在肃宁、河间及邻近地区陆续有带“君子”铭文的汉砖被发现。地下出土的带铭器物与文献的记载出现了惊人的吻合，有学者因此更加确信君子馆的存在，并且对它的具体位置产生了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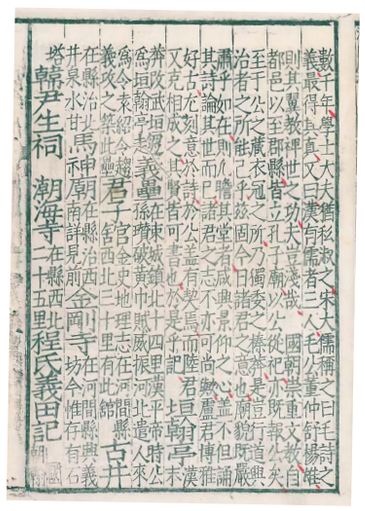
嘉庆年间，肃宁的苗夔最早在武垣城发现了刻有“君子”铭文的汉砖。苗夔在君子砖的发现与传播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发现君子砖之后，苗夔大量拓印君子砖并将拓片赠人，在拓片之上常题赠自述其发现君子砖经历的诗：

县城东南十余里，有汉河间国旧址……当年谁筑日华宫，客馆二十高连空。我来寻访无遗迹……近前拾得一古砖，依稀上有君子字……此应造自建元岁……吾想毛公为博士，献王致敬能尽礼。宫外客馆二十区，三辅黄图始言此。不意今人好附会，君子馆在今府北。岂有当时王都此，馆不在城在郊域。呜呼，后儒安可诬前贤，馆不在此此何砖？

在诗中苗夔认为君子砖是君子馆建筑用砖，因此君子馆的位置就在肃宁县的武垣城。苗夔的这些说法大大提升了君子砖的知名度，并使君子砖为献王修筑君子馆用砖的观点获得了广泛接受，以致人们多以“君子馆砖”称呼君子砖。这种观点最终被光绪《畿辅通志》采纳。

在苗夔的影响之下，一方面将传说中与毛公相关的君子馆变成了人们眼中的史实，并且完整地形成了献王为毛公筑君子馆，君子馆是日华宫之外“客馆二十余区”之一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因之产生的肃宁君子馆与河间君子馆的对立，也造成了君子馆认定的混乱。这一局面一直持续至今。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明确，所谓献王修筑君子馆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君子砖”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也逐渐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墓砖，而非西汉的地面建筑用砖。但献王修筑君子馆这一说法被否认，并不能消除关于献王筑“君子馆”各种争论的价值，因为，这种学术争论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本身就已经成为沧州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明嘉靖《河间府志》中关于『君子馆』的记录

钩沉

沧州孔子学会赴衡水交流儒家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孔维涛 记者魏焕光）近日，沧州孔子学会传统文化游学活动走进衡水，两地文化研究者们积极展开互动交流，共同探讨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新路径。

沧州孔子学会游学团队在衡水参观了孔颖达纪念馆、习三内画博物馆、古安济桥、冀州古城遗址和武强年画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地，深入了解了衡水丰富的历史人文底蕴。孔颖达文化公园拥有丰富的文化展陈和积淀。其中，孔颖达纪念馆内的珍贵文物和“孔祭酒碑”拓片，让参观者深感震撼。通过参观，沧州文化研究者们对唐初杰出的经学家、天文学家孔颖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活动结束后，沧州孔子学会向孔颖达纪念馆捐赠了孔子圣像和《唐代大儒孔颖达》图书。衡水的文化学者也向游学团赠送了《中国唐代文化名人孔颖达》一书，共同分享知识、传承文化。